

黃鎮南文集

鄭海麟 張偉雄 編校

中文出版社

黄遵宪文集

郑海麟 编校
张 伟 雄

中文出版社

黃遵憲文集

¥1,980

1991年10月初版
編校者 鄒海麟 張偉雄

發行所 株式會社 中文出版社

本社 〒606京都市左京區吉田本町29
電話京都 (075)771-4341
振替京都 3-11324

販売部 〒606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91
電話京都 (075)701-2898
FAX: (075)702-4877

ISBN 4-89657-8 C 20097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遵宪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对我国近代化进程产生过影响的人物。

黄遵宪，字公度，别署“观日道人”、“东海公”、“人境庐主人”、“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拜鹃人”诸号，清朝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广东嘉应州（即今梅州市）。

黄遵宪出生于太平天国起义前三年，逝世于义和团运动后五年（一九〇五年），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写下了大量的爱国诗篇和学术著作，其中《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和《人境庐诗草》为世人所熟知。

作为诗人、外交家、政治活动家的黄遵宪，曾出任晚清驻外使馆官员达十四五年之久，足迹遍及亚、美、欧、非四大洲。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黄遵宪不但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做一些有益于我国人民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作，而且还非常注意考察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在任驻日使馆参赞期间着手编纂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人最全面最系统地研究日本的巨著，对我们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的明治维新极有帮助，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是通过这两本书了解到日本人向西方国家学习有成效，从而提出中国的变法必须走明治维新道路的。

在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一八八二——一八八五年），面对美国种族主义者掀起的排华浪潮，黄遵宪作为一位贫弱国家的

外交官敢于向种族主义者展开面对面的抗争，做了不少保护华侨利益的工作，如控驳“新例”^①，保护华侨；整治华人社会，调解堂口之争等等，因而深受华侨的爱戴。

在英国使馆参赞任内（一八九〇——一八九一年），黄遵宪认真考察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且将它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作比较。他观察到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政府政令由上、下议院议决后施行，官员的任命按考试制度考选，虽上悬一君主，但对实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并不妨碍，社会秩序较之美国的共和制度要安定，社会发展采取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改良，不至于出现如美国竞选总统时出现的行贿受贿、嚷乱行刺等弊病。于是他认为中国的国情适宜行君主立宪的政体，中国的改革应以英国的宪政为模式。通过对日本和欧美政体的考察，黄遵宪具备了较为成熟的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和政治才能，成为我国较早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

在新加坡总领事任内（一八九一——一八九四年），黄遵宪能深入侨民社区，体察侨民疾苦，积极着手从事改善侨胞待遇的工作。如奏开海禁，严禁虐待归侨；禁绝海上船艇劫杀之风，保护华侨旅途安全；创立华侨护照制度，为南洋华侨的出入往返提供便利；以及提倡发展华侨教育等，都是黄遵宪在新加坡总领事任内值得称道的政绩。

一八九四年底，黄遵宪结束了长期的外交生涯，由新加坡回国，积极投身于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他参加了上海强学会，与梁启超、汪康年一起创办《时务报》，该报成为戊戌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变法的喉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在一八九七年入湘赞助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封建措施。他提倡“分官权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当时湖南的一班维新派中，黄遵宪是唯一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有切身体验的人。因此，湖

南新政中凡一切改革章程条例，都是由其参酌东西各国制度一手订定。他早些时候写成的《日本国志》，实际上就成了湖南新政取法日本实行改革的标本。梁启超在谈及黄遵宪对湖南新政的贡献时说：“湖南一切新政，皆赖其力。”^②这一点，我们仍须着重提出来加以肯定。

戊戌变法失败后，黄遵宪遭清廷革职放归故里，直至一九〇二年，才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取得联系。随后，他们之间书信往来频繁，讨论了维新党今后的任务，黄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一套改良主义思想，他力倡君主立宪，劝梁启超改革必须“循序渐进”，提出要以“合群”、“开明智”为实现立宪政体的途径，其具体的改革方案是：“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③。黄遵宪的这一改革方案，目的是想变封建君主专制为中央集权（君主立宪）统一下实行联邦式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在当前帝国主义列强环视下的中国，要想维持国家的独立，就必须继续维护中央集权。但是，要使国家民族富强，这又必须实行地方自治。这也就是他一贯坚持的“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的政治纲领。与此同时，黄遵宪在理论上则猛烈抨击封建官僚制度，提倡容纳西方科学思想以改造传统文化。其中许多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梁启超。因此，我们认为不应低估戊戌政变后黄遵宪对维新派的思想影响。

鉴于黄遵宪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政治阅历，系统搜集黄氏各个时期的论著、书信、文札及“笔谈遗稿”等，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的外交生涯、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及文学创作的

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会有所帮助。此亦是我们编校《黄遵宪文集》的目的。《黄遵宪文集》共分笔谈、论著、序跋、书信、公牍等六部分，收入黄遵宪的文稿一百多篇。已刊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人境庐集外诗辑》除外，大致上网罗了黄氏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它不但对我们研究黄遵宪的文学创作和思想面貌有所帮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已刊作品的理解。现将《文集》各部分的编校经过及其重要内容略述如下。

一、“与日本人笔谈”是根据黄遵宪与日本人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等笔谈遗稿整理编校的。笔谈遗稿原藏日本埼玉县野火止平林寺，后移至东京大东文化大学，部分存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藏有全部笔谈遗稿的缩微胶卷，其内容经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笔谈遗稿的发现者）整理编入《大河内文书》。该“文书”内容颇巨，共有九七卷，记录了大河内辉声等日本文人与中国人、朝鲜人笔谈的内容。与黄遵宪笔谈为其中的一部分（约五分之一），其它还有与王治本笔谈，与沈文荧、何如璋、杨守敬笔谈等等。

关于黄遵宪与日本人笔谈，早先由实藤惠秀和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共同编校成《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一书，于一九六八年由早稻田大学东洋研究会出版。此次我们重新编校这部分笔谈遗稿，主要是根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大河内文书》的缩微胶卷，同时也参考了实藤惠秀和郑子瑜编校本。但我们在编校过程中，发现实藤本有不少错漏，且收入了许多与黄遵宪无关的部分。因此，我们此次编校笔谈遗稿除仔细校阅抄写外，还作了精心的选择。与实藤本相较，我们的校本有两个优点：（1）错漏较少；（2）内容集中。当然，必须申明，我们在这里并无贬抑实藤惠秀、郑子瑜两先生辛勤劳绩之意，相反，我们对这两位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开启之功表示崇高的敬意。这是因为编校这部分笔谈遗稿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与黄遵宪笔谈诸君的墨迹

许多地方十分潦草，尤其是酒醉之后，信手书来，秋蛇春蚓，叫人颇难辨认。其间遗稿许多地方又几经虫蛀剥蚀。坐在荧光幕前校阅，常常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几天下来，眼睛红肿异常，每及于此，我们皆以实藤和郑子瑜先生的辛勤治学精神来勉励自己。

关于黄遵宪与日本人笔谈的历史背景，在此略作交代。

黄遵宪于一八七七年底随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抵日，至一八八二年春离日赴美任旧金山总领事，在日前后共四年余。作为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感。他在使馆中除协助何如璋处理外交事务外，公务之余，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极感兴趣，特别留心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过程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来日之后的第二年，即开始涉猎各种有关资料和文献，打算著述《日本国志》，综合性地介绍日本，特别是明治维新的变法改革，以资国人参考借鉴。为了尽快熟悉日本和搜求有关文献资料，他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其中包括诗人、学者、政治家、民间艺人、医生等。这些日本友人大都懂汉文，黄遵宪不懂日文，只能通过笔谈与他们交流思想文化。这些笔谈的片纸只字，日本友人皆视为珍宝，将它装裱珍藏。平林寺留下的大量笔谈遗稿，便是由笔谈主人源桂阁保存的。源桂阁在明治以前是高崎藩主，维新后赋闲，住在距中国使馆不远的东京浅草今户町墨江畔。他特别热心与使馆人员交往，从笔谈遗稿中可以看出，源桂阁等日本文人与使馆人员不但过从甚密，而且无所不谈，这无疑对黄遵宪了解日本极有帮助。另据《大河内桂阁君墓碑》（现座落在埼玉县平林寺内）云：桂阁“天资敏捷，善文辞，工笔札，有诗数卷，清韩笔话百卷藏于家”。黄遵宪与日本人笔谈就是从这百卷（现存九七卷）笔谈中选择编校的。这些笔谈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有关黄遵宪与日本人交流诗文学问，了解日本社会风土人情。

第二部分有关黄遵宪著述《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

因此，“与日本人笔谈”的整理编校将有助于我们对黄遵宪的文化观念和已刊著作的理解。

二、“与朝鲜人笔谈”采自金宏集《修信使日记》，编校过程中作了仔细的校勘。这部分笔谈对我们了解光绪初年的中日朝俄关系史极有帮助，同时亦有助于我们研究黄遵宪的《朝鲜策略》的思想观点。现将其历史背景略述如下。

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军舰云扬号以测量海口为名，闯进朝鲜江华岛附近，与江华岛朝鲜守军发生武装冲突，挑起江华岛事件。结果，朝鲜被迫于一八七六年二月与日本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十二款。该约第一款规定：“朝鲜国为自立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日本并非欲将朝鲜作为平等之民族相待，其意图是要先切断朝鲜与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宗族关系（此时的朝鲜，内政外交虽已实行自主，但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邦），使自己与朝鲜的通交往来不至受到清朝的干预，为日后吞并朝鲜作准备。

一八八〇年七月，朝鲜政府派遣修信使金宏集率一団赴日访问。当时尽管日本方面不太乐意让中国使馆人员与朝鲜使馆之间进行接触，但黄遵宪还是主动拜访金宏集。由此亦可看出黄遵宪对朝鲜前途的担忧和朝鲜所持的积极态度。之后，金宏集回访中国使馆，并与黄遵宪、何如璋详细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问题。会谈期间，黄遵宪告诉金宏集：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为以往四千年所未有，即使尧、舜、禹亦未曾梦见，若按古圣贤之方决不能药今病。他希望金能认清世界潮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黄还告诉金：拒绝与西方国家通商是时代错误，世界的潮流已变，朝鲜必须面对新的现实。黄指出，中国不再能够维护它的传统属邦的安全。因此，朝鲜必须主动与西方列强签订和平条约，否则，西方列强将派遣远征军，并用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事后，黄托金将自己所拟《朝鲜策略》呈交朝鲜国王。金宏集回国后，努力劝说朝鲜国王采纳《策略》中提出的各项建

议，并积极以《策略》中防俄与民族自强的思想影响国王。以上便是黄遵宪“与朝鲜人笔谈”的基本内容及《朝鲜策略》产生的历史背景。

三、论著部分收录了几篇黄遵宪的重要文书。关于《朝鲜策略》校订，我们最初所据的本子是黄遵庚（黄遵宪从弟）传抄本，这个小册子的全文在大陆一直未曾公开发表。大陆学者钱仲联辑《人境庐杂文抄》（发表于《文献》第七辑）内有题为《朝鲜策略引言》一篇，内容节录《策略》的十分之一。但《策略》全文却被《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收录，国外学者广为征引。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称《策略》为对朝鲜的开放“影响深远之书”^④，《朝鲜通史》的作者亦认为《策略》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朝鲜起过一定的影响^⑤。笔者曾大量翻阅朝鲜文、日本文、英文中有关朝鲜近代史研究的论著，发现几乎都提到黄遵宪《朝鲜策略》。这种对外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交文书，在近代中国人中是十分罕见的。

笔者曾将黄遵庚传抄本与《日本外交文书》本互校，发现出入颇大。之后，又找到金宏集《修信使日记》中的《朝鲜策略》，此为黄遵宪送呈朝鲜国王的正本。三种本子互校后，发现《日本外交文书》本脱、错、漏最多，此本只可供参考，不可供研究引用。遗憾的是，英文和日文著作中研究朝鲜近代史或中日韩近代外交史的著作，几乎都是引用《日本外交文书》本子^⑥，今后凡研究引用《朝鲜策略》，当以笔者校正本为据。

《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是研究黄遵宪变法改革思想的重要文献。初载《湘报》第五号，后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湖南广东情形》引录（略有删节），此次根据《湘报》所载全文校点。

《敬告同乡诸君子》为近年新发现的黄遵宪佚文，原件藏梅州市博物馆，为梅州市人境庐黄遵宪纪念馆黄敬昌（黄遵宪曾孙）提供。该文对研究黄遵宪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

四、序跋部分收录黄遵宪历年作序跋三十三篇，部分曾发表在黄氏已刊著作中，余则散落在他人诗文中，且遍布海内外。这些珠玉遗篇，对研究黄遵宪的交友行谊以及诗文论著不无助益，故集为一类。在日本时，笔者曾广泛翻阅与黄遵宪同期或有所交往的日本文人的诗文论著，披沙淘金，努力搜求黄遵宪的遗文佚作。其中冈鹿门《北游诗草序》，就是从东京大学图书馆中找出来的。另在东京时，笔者还发现不少日本文人的诗集经黄遵宪批阅过，其中卷头有不少黄氏评语（冈鹿门《北游诗草》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评语对研究黄遵宪的诗学观点不无裨益，可惜该评语过于零碎，难缀成篇，只得留待他日另作整理，以别的方式公诸同好。

五、书信部分辑录了近年来陆续校点披露的一些黄遵宪信札，如《致王紫铨书》（浙江省图书馆藏），《致汪康年书》（上海图书馆藏），《致梁启超书》（北京图书馆藏）。《致王紫铨书》内中涉及中日琉球交涉事项，对研究光绪初年的中日关系史不无帮助。《致汪康年书》则较为详细披露了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派创办《时务报》的经过，为研究《时务报》及黄遵宪在《时务报》创办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致梁启超书》九通，它是研究黄遵宪晚年思想及其影响的极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信札书写的历史背景介绍如下。

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遭革职解归。他虽息影政坛，偏处粤东一隅，但这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忠实的改良派政治家，并没有止息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时常以“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自勉，冷静地注视着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仍抱有很高的热情。章太炎在论及戊戌后黄遵宪与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关系时说：“有为既败，杨刘死，张之洞、梁鼎芬始与有为抵拒，其党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标以连蹇死，惟黄遵宪始终依之。”^①可见黄对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仍寄有很大希望。特别是一九〇二年与在日本的梁启超恢复联系后，为他窥测政坛，了

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他同梁启超陈述今后的打算说：

“数年闭门读书以广智，习劳以养生。早夜奋励，务养无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学术，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尽吾力为之，成败利钝不计也。”^⑧由此看来，黄遵宪的政治热情和变法决心并未因政变的挫折而消沉、减退，相反，政海的风云浮沉给了他一个冷静地思考问题的绝好机会。诗人痛定思痛，睥睨政坛，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直至生命临终之际，他还对梁启超说：“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⑨黄遵宪晚年的心境和思想，在《致梁启超书》中作了充分的表露和宣泄。在这些信中，黄遵宪与梁启超详细讨论了维新党今后的方针大计，同时还通过对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的许多思想言论的评论，阐述了自己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以及所持的政治态度，它对梁启超的思想发展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年谱长编》指出：“黄遵宪在维新派里面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见解和主张，以及给维新派的赞助和鼓舞，在当时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赞助鼓舞和规正先生和他的事业上实与梁颇多共通之处，有很大的力量和功绩。”^⑩由此足见这批书信的分量和价值。

《致梁启超书》部分最初发表在《新民丛报》（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但属节录发表，很不完整。《梁启超年谱长篇》、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亦有节录。现根据北京图书馆藏件，综合参考《新民丛报》、《梁谱》、《黄谱》等补齐，尽量使其完整，并考定其年月日，厘订时间先后。

此外，《与陈伯严书》、钱仲联辑《人境庐文钞》亦有收录，但多有删节。该书原件原藏陈伯严子陈寅恪处，陈寅恪下世前转交黄海章（黄遵宪侄），承黄海章先生之赐得窥该书全貌。今海章师亦下世矣，不胜怀念。另，《与严又陵书》、钱仲联辑《人境庐杂文钞》、吴天任《黄谱》亦有收录，但皆有删节，现据中华书局版《严复集》第五册所收校定。

六、公牍类所收为黄遵宪为宦二十年间手拟文牍。此外有些虽为公度所拟，但已收入他人文集者不录（例如，黄遵宪在驻日参赞任内代何如璋上书总理衙门论辩琉球事书、论辩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据梁启超云十有七八皆出自黄之手笔。另据“与日本人笔谈”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条有：“梅史：今日要发奏折，乃将今年所办之事奏皇上，此事黄主稿，廖写之，而弟封之。”但这些文牍皆系何如璋名下，收属了温廷敬编《茶阳三家文钞·卷二》，不予收录）。公牍部分收录了近代发现的《上郑钦使禀文》，原藏梅县馆档案馆。该文对研究黄遵宪在美国与种族主义势力作抗争，运用美国法律条文保护华侨权益，以及调解华人社会内部矛盾等史事极有帮助。此外，黄遵宪任署理湖南按察使时的一系列文札，亦有助于我们了解黄氏在湖南变法期间对政治改革、整顿刑狱、禁妇女缠足、处理教案等方面的革新思想和政治活动。

黄遵宪是一位思想敏锐、勤于动笔的文人，在他生前写下了大量风格各异的论著文章，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文集，其间必定还有未被发现者。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做到网罗遗文，广事搜辑，订正校本，反复推敲，考索异同，厘定时间先后。然才疏学浅，挂一漏万，错误之处，还望海内外方家同好指出订正。

最后，必须感谢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注释

①一八八二年美国政府议行的《排华法案》

②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湖南广东情形》

③光绪二十八年五月《致梁启超书》

④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第210页

⑤参看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朝鲜通史》下卷，第57页

⑥如Frederick Foo Chien: “The Opening of Korea”（高丽之开放），The Shoe String Press, Inc., 1967; 原田环：《朝鲜の近代设想——俞吉濬と朴泳孝の独立思想につム》，见《史学研究》第143

号; 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等著作

⑦章太炎:《箴新党论》,见《民报》第十号,1906年12月20日出版

⑧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致梁启超书》

⑨《入境庐诗草·卷十一》“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

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8页

序 言

一八七一年，《日清修好条规》缔结，中日间开始互派常驻的外交使节。一八七七年，何如璋作为初任驻日公使赴任，同行的有参赞黄遵宪。黄遵宪在日期间，一方面努力解决当时错综复杂的琉球及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又深入地研究日本社会，与日本的文人学者广泛接触，诗文唱和。重野安绎、龟谷行、岡千仞、森槐南、大河内辉声（原高崎藩主，子爵）等都是黄遵宪的常客。

黄遵宪对当时的日中间的文化学术交流，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根据在日期间的切身体会，写成了诗集《日本杂事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明治日本社会百态。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看出黄遵宪是如何评价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此书有实惠藤秀与丰田穰的日文全译本，收在平凡社的东洋文库本里。然而，黄遵宪最受注目的著作，还应数四十卷本的《日本国志》，此书系统地论述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作为当时研究日本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水平最高的。此书成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〇年刊行于广东。

我本人以前也曾对《日本国志》有过浓厚的兴趣。其理由是，当时我推测康有为的《明治变政考》是以该书为基础编写的。当时，《明治变政考》是否实际存在还不清楚，被认为是一本虚构的书。直到一九七四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彰健教授，在刊行《康有为戊戌真奏议》时，附录部分收录了康有为的《明治变政考》，我们才初次看到其全貌。

在黄遵宪研究方面，以《日本国志》为中心，对黄遵宪的思

想和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的代表作，要数郑海麟先生的《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此书对《日本国志》的研究，占全书的四成多。以前，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没有人象郑先生这样对黄遵宪的思想和行动，作这样深入的考察与研究，郑先生以此研究，一跃成为学术界注目的新秀。今后，有志于黄遵宪研究者，势必要参考郑先生的这一研究著作吧。

此次，郑先生约同留日的黄遵宪研究者张伟雄先生，共同编校《黄遵宪文集》。张伟雄先生现在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室平川祐弘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张先生利用在日的便利条件，重点研究了黄遵宪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一九八九年，完成了硕士论文《黄遵宪的日本观》（见《论丛》第一卷，亚洲教育文化交流会，一九九〇年；及《比较文学文化论集》第八期，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会，一九九一年）。在此基础上，现在张先生正着手继续撰写有关黄遵宪的博士论文。

郑海麟先生于一九九〇年秋来日，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今年二月，转赴东京，正式开始与张伟雄先生共同编校《黄遵宪文集》。在已有的基础上，他们继续在东洋文库、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处收集与黄遵宪有关的文献资料，不遗余力。郑、张两先生研究方向一致、志趣相投，可以说，此次《黄遵宪文集》的顺利出版，是两位同心协力、共同研究的结果。

《黄遵宪文集》共分笔谈、论著、序跋、书信、公牍等六部分，收入黄遵宪的文稿一百多篇。黄遵宪生平曾自己编集出版过《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和《人境庐诗草》。一九六〇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整理了黄遵宪未发表的一些诗词，出版了《人境庐集外诗辑》。在日本，实藤惠秀与郑子瑜两先生编集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而至于黄遵宪的其他文稿，至今还没有一本文集出版过。此次郑、张两先生的

工作，可以说是起到了补缺的作用。

黄遵宪是一位勤于写作的文人，他生前曾留下大量风格多样的文稿，但却散佚在各处。郑、张两先生在此文集的编校中，不辞劳苦，细心搜集、整理，终于得以将黄遵宪作为文人的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展现了出来。两位先生的努力，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莫大的方便，是对黄遵宪研究工作的一大贡献。《黄遵宪文集》，将成为研究者们不可少缺的资料之一。

黄遵宪不但是一位外交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在湖南的变法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为日中文化交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日期间，他与不少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黄遵宪并不是一位单纯的亲日家，而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知日家”。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日中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到相互的国家去学习和研究，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此次，《黄遵宪文集》由京都的中文出版社出版，为日中间文化学术的交流又添了一段佳话。在此，特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编校者郑海麟及张伟雄两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

山根幸夫

于东洋文库近代史研究室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八日